

专题:科技外交——中国现当代科技史研究的新视域

尼克松政府时期中美民间科技交流与政治博弈

张 静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要 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开展与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的开启基本同步,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并没有构成因果关系。在冷战背景下,民间科技交流成为缓和敌对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外交工具,直接服务于两国政治与外交目标;参与跨国交流的科学家等人民主体,既是人民外交中两国政府政治博弈的标的,又受到国家、政府、政党等传统政治性力量的塑造。在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未建交状态下中美科技交流的民间形式与两国政府掌控的政治实质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张力与矛盾,致使民间科技交流未能促进政治关系,反而因国内政治和国家间政治的影响而陷入困局。

关键词 尼克松政府 中美关系正常化 民间科技交流 人民外交 政治博弈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441(2023)03-0325-18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依据外交关系状态、对方国家的政治性质、科技活动的内容,将对外科技关系区分为科技合作、科技交流与民间科技交流三类。1971年春,美国科学家亚瑟·高尔斯顿(Arthur W. Galston)、伊桑·西格纳(Ethan Signer)的访华,重新开启了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历史。至1979年1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签署,两国科技关系的性质由“民间科技交流”转为“科技合作”^①。期间,在“一个中国”尚未形成共识、中美尚未建立政治关系的状态下,两国民间科技关系除“不能搞政府间交流”外,以民间方式开展交流的对方

收稿日期:2023-02-09;修回日期:2023-07-11

作者简介:张静,1983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特聘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缘起、实践与叙事(1971—1979)”(项目编号:20BZS082)。

① 关于“科技合作”“科技交流”“民间科技交流”的界定及1971年5月高尔斯顿和西格纳的访华,参见参考文献[2]第123、137—138页。关于1979年1月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签署,参见张静《邓小平与中美科技合作的开展(1977—1979年)》,刊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14—23页。

“必须同台湾没有关系”^[1]。

有鉴于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开展与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基本同步,有学者倾向于视各方历史行动者所持的“促进两国人民友好交流和两国关系发展”的愿望为中美民间科技交流之目的,并以“促进”或“推动”重构史事、评判两个历史进程间的关系^①。以目的论重构历史,极易陷入从结果出发构建因果关系的逻辑陷阱,将历史事件发生的多元秩序简单化一。首先,历史行动者只能观察事件发生时和发生后其所参与、视域所及的部分,并依照时间秩序作出解释。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不同历史行动者的参与行为、视域范围并不一致,每一条事件序列都只是历史时空的局部。以全知视角重构历史者,既要能经验不同历史行动者的行为和视域,也要覆盖后者所不知的其他事件序列。其次,由同一历史行动者参与的事件序列虽在时间上前后相续,却不必然具有因果关系;处于不同历史行动者的事件序列之交叉处的同一事件,其发生具有多因性^②。

此外,鉴于尼克松政府时期中美科技交流的“民间”形式,学者多从跨国史的视角审视非国家行为体推动科学家、科学知识与技术跨国流动及区域性、国际性网络建构的历史行动与意义。这一研究视角潜存对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国家、政府、政党等分析单位的修正,但也因聚焦于中下层而忽视民族国家时代特别是冷战时期强大政治力量的统摄^③。在科学家、科学知识与技术跨国流动的历史中,国家权力是一种实质性的存在。国家间政治博弈与民间科技交流的关系是何种状态?尼克松政府时期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发生与演变是探讨这一问题的独特案例。它既展现了“科技”如何成为缓和敌对关系的手段而非强化对峙的工具,又揭示出国家、政府、政党等传统国家权力如何利用并塑造作为跨国交流主体的科学家^④。

-
- ① 1971年4、5月间,美国科学家高尔斯顿和西格纳的访华申请不但获得中国最高领导人批准,而且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接见。冷战时期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序幕很快随之开启。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既有历史叙事常在“乒乓外交”背景下解释两位科学家申请访华的成功,视这些民间交流事件为1971年7月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访华、两国政治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先声,并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科学界等民间团体持续不断的努力终获成功,不但重启对华科技交流,还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改善。代表性观点如:Kathlin Smith利用美国科学院档案,以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在1966至1979年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强调美国科学家团体之力发起推动对华民间科学交流、促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参见参考文献[57]第114—136页。Richard P. Suttmeier认为科学、技术和政治因素混合在一起,成为冷战科技外交中一项有趣的新举措,有助于中美两国重建外交关系。Richard P. Suttmeier, "From Cold War Science diplomacy to partnering in a networked world: 30 years of Sino-US relatio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China*, Vol. 11 pp. 18—19. 最新的研究参见Pete Millwood, *Improbable Diplomats: How Ping-Pong Players, Musicians, and Scientists Remade US-China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Pete Millwood强调中美两国的运动员和物理学家、表演艺术家和地震学家在重建美中关系、重塑两国人民间的认识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帮助改变了1976年之后的中国。
- ② 物理时间的研究为理解历史时间带来的启发,参见卡洛·罗韦利著、杨光译《时间的秩序》,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31—39页。
- ③ 关于科技史研究中全球史转向的“在地化”(localization)问题,参见Fa-ti Fan, "The Global Turn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12) 6, pp. 251—256.
- ④ 弗朗西斯·福山有关国家构建与国际秩序的研究,亦旨在将国家角色、实力、制度等问题重新带回政治学与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视域,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郭华译、孟凡礼校译《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

本文依据档案资料和相关研究,从政治博弈和国家权力运作的视角,分析尼克松政府时期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决策、制度、渠道、形式等多个方面,探讨国家间的政治博弈与“人民外交”(popular diplomacy)^①、民间科技交流的相互关系。

1 美国单方推动的科技交流

科技援助、科技交流与合作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的重要工具^[2]。尼克松政府实施以“缓和”(détente)与“均势”(balance of power)为主要特征的新冷战战略。科技交流与合作成为美国对苏联、中国等“敌对国家”外交的重要工具。在1968年1月举行的第134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受制于国内政治压力,中方再次拒绝了美方关于科技交流的建议^[3]。但是,在尼克松政府就任之初,美国务院于1969年2月筹备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时,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向白宫建议:为表诚意,再次向中方提出订立包括交换记者、学者、科学家和科学信息等在内的和平共处协定([4],页170—171)。此次会谈虽然因意外事件而被中方取消,但美方仍然在以罗杰斯署名的声明中表示,会继续准备与中方在任何时候会谈^[5]。

为更好地使科技服务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美国务院加紧了政策研究与外交行动。在其与日本外务省于1969年6月上旬主办的第10次日美规划会谈中,“科学技术对于外交的影响”与“长期对华政策”成为重要内容^②。7月21日,即尼克松访问亚欧多国的环球旅行前,国务院又宣布放宽对华贸易和人员旅游的限制,允许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六类美国人员访问中国。这成为尼克松政府为缓和对华关系颁布的第一项单方面主动政策^③。10月,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亚洲共产党事务办公室主任保罗·克里斯伯格(Paul H. Kreisberg)建议,重新评估有关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成员国资格问题的政策,在未来对华主动政策中或可允许北京加入非联合国机制的科技组织等专门机构^[6]。

1971年1月26日,在美国众议院科学与航天委员会举行的第12次年会上,来自四大

① “人民外交”译自美方讨论北京对美政策时使用的英文词组“popular diplomacy”,原文出自 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24, Washington, May 27, 197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p. 327—328。中国学界对“人民外交”的使用多等同于“民间外交”,针对的英文为“people to people diplomacy”,对其界定为不同国家的人民间直接进行的外交,但也存在不断泛化、缺乏合理界定的问题,参见张志洲《民间外交含义的学理分析》,刊载于《国际观察》2008年第5期第19—24页。但也有历史学者关注到在新中国中日关系史中,“人民外交”之不同于“民间外交”,在于其政治性、中国官方行为性和目的性等方面的不同,参见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之“人民外交”的生成过程与概念》,刊载于《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第16—30页。

② 共三个主题,另外一个主题是“朝鲜的未来”。Letter from Henry Owen, Chairman of the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to Mr. Shinichi Kondo, Deputy Vice-Minister of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February 3, 1969. Letter from Shinichi Kondo, Deputy Vice-Minister of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to Henry Owen, Chairman of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February 12, 1969. RG 59, Planning Coordination Staff (S/PC), Country and Area Files (1969—1973), Box 400, Folder Japanese-US Planning Talks 1970 (2 of 2), NPMS, NARA II.

③ 六类人员包括议员、记者、教师、学者、学生、科学家和医生。关于尼克松政府颁布此政策的台前幕后及其间曲折跌宕,对华管制政策的设计过程、发布时机的选择及其政策意图等问题,参见参考文献[3]第180—192页。

洲、七个国家的十几位科学家、教育家、议员参会,专门讨论“科学与技术为解决当前关键的国家与国际性问题中应当被如何利用”。罗杰斯发表主题演说^[7],被认为是尼克松政府意在通过推动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促进包括改善对华关系在内的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8]。2月,一份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经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新闻署、中央情报局共同商讨完成的《美国对华政策研究报告》明确提出,在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建构中,美国对华科技信息交流将成为一个重要杠杆:“如果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有显著改善,苏联将仔细评估这些变化对其自身利益的潜在影响。他们特别关注的是,美国可能向中国提供或允许第三方国家向中国提供科学信息和技术,这些信息和科技将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中国对抗苏联的军事潜力。”^[9]

不过,美国国务院以科技交流改善对华关系的系列外交政策与行动未能实现预期效果。罗杰斯在国会讲话中,曾将中美科技人员“从未直接互访”的责任归咎于中方。对此说法,中国外交部和科学院并不以为然。后者认为,两国科技界联络中断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府一直坚持敌视和封锁我国的反动政策、限制和阻挠两国人民往来”;罗杰斯的表态是“在国际社会大肆渲染,混淆视听”。为表示抗议和抵制,中科院发布内部规定,要求自1971年5月起全国暂时停止就科技资料交换与美联系,但不拒收其所寄资料^[10]。

随着尼克松政府不断释放对华缓和信息,美国科学家个人和科学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推动的对华民间科技交流行动也不断增加。然而,相较于美国国务院单方面对华缓和行动,他们也未未能获得中方更积极的反馈。1971年2月,美国家科学院执行秘书杜德(W. Murray Todd)通过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拉德伯格(Erik Rudberg)与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联系,转达美国三家全国性科学组织——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社会科学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对改善与华学术交流、特别是与中国的全国性学术机构——中科院改善关系的愿望。拉德伯格还特别指出,美国家科学院与瑞典科学院是“非政府性机构”。但中科院经商外交部,并未对其予以答复^[11,12]。此外,对来自美国的个人、团体、机构的访华申请和寄送资料等信件,特别是在“乒乓外交”后自美国发来的十几份访华与资料交换申请,中方均“不予置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些毛主席语录被引用于中科院外事组处理美国来信的发文函抬头^①。

进一步对比几乎与高尔斯顿和西格纳同时发出访华申请的美国家叶希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解剖学教授多米尼克·P·普尔普拉的遭遇,高尔斯顿和西格纳获得中国最高领导人批准来华访问的偶然性更为凸显。普尔普拉是叶希瓦大学解剖学系教授兼主任,同时担任娄斯·肯尼迪精神迟滞及人体发育研究所所长。1965年2月,他在古巴参加“哈瓦那科学讨论会”时,结识了中科院学部委员、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教授。普尔普拉的学术资历、声誉及反越战政治态度都与高尔斯顿相

① 中科院与美国1971年1月至7月间往来专卷有几十份来自美国的访华申请,在此不列。“毛主席语录”参见中科院与美国1971年1月至7月间往来专卷第1—2、12、48、50、51页等。

近。早在 1965 年 10 月,他就曾给张香桐写信,表达访华意愿,并提议在上海组织一次脑科学国际研讨会。不过,遵循中科院联络局的意见,张托辞拒绝了他。此后,他又于 1967 年寄赠两批论文复印本。1971 年 4 月 15 日,普尔普拉再次给张写信,重提在上海举办国际研讨会事^[13]。然而,迟至 1971 年 6 月 4 日,即高尔斯顿和西格纳离京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和科技组才将他的申请以及“邀请普尔普拉等科学工作者来我国访问”的建议,提交给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和中国外交部、中科院。但中科院再次向外交部建议,对普尔普拉的申请不予考虑^[14]。

总的来看,至 1971 年 4 月底,除了高尔斯顿和西格纳,无论是美国务院,还是美国非政府机构、科学家团体及科学家个人推动的对华科技交流,都未能成功获邀。换言之,关于中国最高决策者为何一改拒绝与美开展科技交流态度、邀请两位美国科学家访华的问题,很难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包括周培源出席帕格沃什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在内的中美科学家交流的历史事件序列中觅得缘由^①。此外,由于美国升级在老挝、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和对越战争,中方于 1970 年 5、6 月两次推迟并最终取消了第 137 次中美大使级会谈。被排挤在对华决策与外交行动之外的美国务卿和国务院高级官员们,对于 1969 年 8 月以后白宫(尼克松-基辛格决策核心)与北京(毛泽东-周恩来决策核心)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巴黎等幕后渠道不断开展的秘密外交毫不知情。直至 1971 年 7 月基辛格访华期间,北京方面始终拒绝对美国务院主导的官方外交行动做出正式回应^②。因此,两位美国科学家访华事件之所以发生,也很难从美国务院开展的政府外交的事件序列中得到解释。

历史学者作为占据“上帝视角”的全知者,对历史事件的回眸反观常在无意识中受到融贯性(Consistency)思维的统摄,陷入按照单一的事件序列、以时间先后为因果根据来排布史实的逻辑陷阱,忽视对历史行动者的视域有限性的自觉^③。具体而言,从上述两个事件序列追踪两位美国科学家访华事件发生的缘由并不合理,因为无论是美国务院还是中科院,这些机构中的高级官员作为历史行动者,对于白宫与北京最高决策者通过幕后渠道开展的秘密外交并不知晓。两位美国科学家访华事件的发生,与此前两国科学家之间的交往、美国务院的单方面推动,难以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历史学者因中方资料的缺

①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中美科技关系,参见 Gordon Barret, *China's Cold War Science Diplom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王作跃(Wang Zuoyue)著,安金辉、洪帆译《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 直至巴基斯坦时间 1971 年 7 月 9 日凌晨 4 点 30 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飞赴北京前的几个小时,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才将部分信息告知罗杰斯。关于中美秘密外交参见张静《解密中美秘密外交(1969—1972)》,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 章。

③ 关于“融贯性”思维,借鉴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她指出,现代观念习惯于认为“意义包含在过程之中,个别事件从作为整体的过程中获得可理解性”,然而“融贯性”这一现代观念的内在思维,不过是“偏执狂避难所”,“或通常用来证明上帝存在”。因为人们的行动可以任何一种假设为基础,在融贯性思维在这种假设基础上对行动推演,从而使假设变真、成为实际实在的“客观”的真实,而且最终将在现实中造成意义和“有用”的一系列结果。于是,“最初仅仅是个假设,可以被实际的事情证实或证伪的东西,在融贯行动的推演中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反驳的事实。”“历史学家在回顾历史过程时,已经十分习惯于发现‘客观的’,独立于行动者目的和意图的意义,而在他试图洞悉某些客观趋势的过程中很容易对实际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参见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张立立译《过去与未来之间》,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3—85 页。

乏,也只能看到美国方面的主动而不知中方的态度。

两位美国科学家的访华申请直接进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最高决策者的视野——其发生虽有偶然性,但其“能够”发生必然被决策者赋予了明确的目的性。对中美最高决策者而言,它既是两国通过幕后渠道秘密外交开展政治博弈的历史事件序列中的重要一环,又是以“争取人民”为目的的各种形式的人民外交事件序列的一个重要接合点。

2 人民外交背后的政治博弈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反帝、反侵略的革命斗争中,逐步积累起了将外国的人民、工人、农民与列强政府、资本家和地主相区别,对西方世界施以人民外交的经验。1951年初,毛泽东修改《〈实践论〉解说》。其中第二部分谈及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他加写道:“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15]在对外交往中,执政后的中共领导人更为明确地推动对美、日等未与中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人民外交。在朝鲜战争时期,周恩来针对对外宣传工作提出:“全世界人民包含美国人民、日本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争取他们。……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同盟国家、帮凶国家的反动政府。”^[16]1952年4月30日,他向中国驻外使节阐明“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无论对兄弟国家、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影响和争取人民”都是新中国外交方针与任务的核心^[17]。

通过人民外交的形式实现“以民促官”的政治目标,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在中国对日关系中最为显著。1955年9月,毛泽东对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作出指示,要求充分利用“已有广大舆论基础”,促压“尚不愿意谈这个问题”的日本政府^[18]。1956年6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在贸易、文化、侨民等多方面开展民间交流的成果,强调“中日两国人民之间这种频繁的和有成效的接触,受到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和支持,而对于日本政府,也不能不发生日益显著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除了与日本、法国、芬兰、挪威、瑞典等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间的直接交往,中国政府还积极推动与这些国家议会代表团或议员互访,以推动加深和扩大双边政治关系^[19]。

经由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中美最高领导人在1970年11月就美国总统尼克松派特使来北京商谈一事达成共识([20];[21],页409—411、415)。此后,毛泽东开始亲自推动对美外交由幕后渠道秘密联络转向以美国人民为对象的人民外交。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中南海书房长谈,第一次明确表达欢迎美国总统访华。之所以邀请斯诺第三次来华,毛泽东曾在事后表示,意在“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在谈话中,他特意允许斯诺向国际社会公开发

表同周恩来的谈话^①。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拍摄于国庆节时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幅照片,并在右上角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4],页231—250)显然,毛泽东以独特的方式向全世界特别是中国人民,释放了调整对美关系的新信号。他不仅通过国内宣传为转变对美政策建构合理性、重塑中国民众的思想,还通过斯诺的新闻报道向美国民众和全世界释放改善对美关系的善意,倒逼美国政府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华政策,从而掌握发展两国关系的主动权。“乒乓外交”和两位美国科学家的访华,正是发生于此历史语境之中。

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很快转向“人民”。1971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发表第二个对外政策报告:“在今后这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能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措施,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并且消除那些妨害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22],页69—70)3月16日,美国政府虽然宣布延长半年对中国(不含港澳台)、朝鲜、越南北部和古巴的旅行限制,但又将中国与后三者相区分,表示对于中国“我们遵循一种更为自由的护照审批政策,并且对任何合法目的的申请都予以批准”^[23]。这一政策在事实上取消了美国政府有关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大陆旅行的限制,即美国公民不再需要获得特别批准或办理特别护照。美国务院代表在发言中解释,这个决定符合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的诺言。白宫发言人齐格勒(Ron Zeigler)也提请人们注意这项决定:“我们希望对方有互惠的行动,但是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24],页908)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华主动政策是单方面的,并不需要中国方面做出对等的政策反应。

在这场由中美两国领导人亲自推动的“人民外交”中,“人民”不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作为具体,他们既是两国民间交流的参与者,又是国家权力施用的对象;作为抽象,他们成为国家间政治博弈的标的。1971年4月1日,美国务院执行秘书埃利奥特(Theodore L. Eliot, Jr.)向基辛格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外交动向的报告。针对1970年下半年至1971年4月中国与意大利、加拿大等8个国家正式建交的情况,报告指出:“有迹象表明北京的外交攻势正变得愈发强力,加强了灵活性,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②几天过后,毛泽东在4月6日晚决定邀请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页231—251)。“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巨幅标语挂在两国乒乓球友谊赛现场^[25]。周恩来对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21],页451—452)

同斯诺访华的各种安排一样,通过“乒乓外交”,中国领导人再次以中国、美国和世界

① 参见: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刊载于《世界知识》1993年第24期第14页;参考文献[18]第421页。1971年4月,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斯诺与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近5小时的谈话。中共中央于1971年5月31日向-down至县级干部转发了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

② Memorandum for Mr. Henry A. 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From Theodore L. Eliot, Jr., Executive Secretary,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 1971. RG 59, Lot Files 72D456, 74D88 & 74D400, Subject Files of the Office of Asian Communist Affairs (ACA) (1961-73), Box 5, Folder POL 1 Chinese Foreign Policy (general) 1971 China, NPM-SP, NARA II. 这一时期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还有智利、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科威特、喀麦隆、尼日利亚。

人民的“团结”与“友好往来”对内论证、对外彰显中美缓和的政治意义,同时通过幕后渠道主动推进对美政治博弈,将政治压力转向尼克松政府。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沉默几个月之久的巴基斯坦渠道向美方表示: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国务卿甚至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①。5月10日,白宫将由基辛格起草、经尼克松批准的对中方的答复,交给巴基斯坦驻美大使。5月17日,北京收到回信([24],页929;[26])。

为博取政绩,尼克松不希望美国任何政要在他之前成为访问中国的第一人([21],页917,942—943)。他尽管可以拒绝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访华,也可以要求中方在他访华前不要邀请任何美国政要特别是民主党总统竞选人访华^[27],但无力钳制中国的人民外交。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美国科学家高尔斯顿和西格纳的访华申请,进入了中美最高领导人政治博弈的视域。在1971年4月14日至19日先后提交给中国驻加拿大渥太华大使馆、驻伦敦代办处^②、驻法国大使馆、驻越南大使馆的访华申请中,高尔斯顿和西格纳反复论证着他们访华的政治意义——“促进中美两国科学家和人民间的交流”,益于中美两国人民^[28—30]。最终,中共中央批示同意邀请两位美国科学家,并由中科院和国家旅游局共同承担接待他们的政治任务。4月底,中国外交部欧美司电告中科院外事组,要求其调研两位科学家的情况并制定接待方案^[31]。按照惯例,对于申请来华的外国学者,除他们的专业与学术情况外,其政治立场、对华态度、与台湾的联络、与中国学者的关系等“政治情况”都是不可或缺调研内容^[32]。两位美国科学家的全部访华日程亦由外交部草拟、经中央审批后,下发至中科院及有关单位,并送达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及有关省市外事组^[33]。中科院和旅游局联合接待小组根据外宾需求对其抵京后日程的修改,亦需抄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外交部领导、欧美司、中联部、总参二部、地方外事组、旅游局等相关部门或人员^[34]。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亦会对他们的行程安排等作出具体指示^[35]。

陪同两名美国科学家参观访问的接待人员的身份是特殊的。尽管任务下达紧急、准备时间有限,他们仍做了充分的准备,坚信并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学习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请外交部有关领导介绍情况,深入调查高尔斯顿、西格纳两人的政治、历史、专业等情况。此外,他们不仅要在外宾参观前与参观单位开会研究,还要对高尔斯顿希望会见的学生与正在下放中的老同学提前做工作,确保其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振作精神,现身说法宣传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多做外宾的工作”。在接待过程中,他们始终坚持“少讲多看、让事实说话”的原则。而所有这些工作,意在确保及时发现来访者对中国的误解和不知情的状况,有针对性地解答其疑惑、纠正其错误想法、消除其思想警惕^[36—39]。

① 《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1971年5月29日),转引自参考文献[19]第97页、参考文献[18]第452—453页。

② 由资料中来看,高尔斯顿与西格纳向中国驻伦敦代办处提交的访华申请受到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帮助。

为确保所有的接待工作都有据可查且能及时上报,自两位美国科学家入境起,关于其最新情况都被详细记录,包括他们对中国的评论、参观感受、提问及具体要求等。此外,在简报中,接待人员还要对于外宾的发言与表态等“主要表现”和“表现出的主要问题”做出评价^[40, 41]。这些记录呈现出接待人员观察两位美国科学家的视角,而评论则既是审查又充满期许,透露出他们试图从后者的言行中捕捉到中国及他们自身的形象。情况简报由接待人员草拟,经联合接待小组誊抄整理、负责领导审批、中科院办公会讨论确定,再以铅印版编号简报的形式上报中央领导及相关部门。在每份情况简报抬头的上方,都以红色黑体字标印着一则“毛主席语录”,如“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终究会冲破杜勒斯之流的障碍,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42]。自1971年5月10日至24日,两位美国科学家在华访问共15天,产生情况简报13份、总结1份^[37]。

在两位美国科学家访华期间和结束后,接待组还以参阅《参考资料》的方式,间接地关注并收集、汇报两位美国科学家访华事件在美国掀起的政治涟漪。听闻两位科学家谈到,罗杰斯发表了有关他们访华的讲话,接待组当即核查了1971年5月22日下午版《参考资料》,并在5月23日汇报两位美国科学家的访华情况时订正道:“美新处的报道是这样说的:‘他说(指罗杰斯),美国对于大陆中国已给美国记者和一些美国科学家发了签证的消息感到满意。’”^①5月30日,《参考资料》刊登文章《美报说美两科学家访华“打开了第二轮的乒乓外交”》,再次编译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在5月21日对罗杰斯讲话的报道和分析。该报道称,美国务院对两位美国科学家访华的反应,与以往“对政府进行批评的人自行其是地去访问共产党中国”的“冷眼相看”态度不同:“国务卿罗杰斯现在却欢迎这两位科学家访问中国。……他认为面对面的接触是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有益的步骤,由于科学家的工作具有国际性质,因此科学家特别有条件来采取这样的步骤。”^[43]6月28日,《参考资料》继续编译了6月25日高尔斯顿和哈佛大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参加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对华政策意见听证会的证词。前者转达了周恩来对台湾政策的立场,并建议该委员会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的政府,“不再承认和支持蒋”;后者则呼吁接纳北京作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②。显然,对美国科学家以个人身份来华访问交流之事,中方不仅赋予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更对事件将产生的影响寄予极高的期待,希望能借此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地位,并通过影响美国会和公众舆论倒逼美国政府改变对台问题的立场、改善与华关系。

中美两国政府间的政治博弈隐匿于民间科技交流的背后。双方尽管有着改善政治关系的共识,但“争取人民”是这场博弈的标的。周恩来在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谈话时曾表示:“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

① 钱大镛1971年5月23日下午2点40分电话记录。此次记录罗杰斯发表讲话的时间为北京时间,华盛顿时间为5月21日。

② 参见《高尔斯顿等在参院对华政策意见听取会作证补志》,刊载于《参考资料》1971年6月28日(下)第4—5页。1972年5、6月间,孔杰荣作为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成员受邀访华,并受到周恩来的会见和宴请。中国科学院外事组《接待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活动简报》(第1期),1972年5月23日。《同美国〈纽约时报〉联合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等人的谈话》(1972年6月16日)附录,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周恩来自述》第232页。

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21], 页 451—452)“乒乓外交”在国际社会和美国内掀起一股强大的“中国旋风”。美国务院涌来“如洪水般的信件。……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搭乘下一班飞往北京的飞机……成千上万个电话和无数的请求都是关于与中国的贸易”,让国务院的官员们应接不暇^[44]。美国商人们纷纷要求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并且得到了不少参议员的支持。由年轻的民主、共和两党国会众议员组成的美国年轻政治领袖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Young Political Leaders)申请访华。美国科学家们纷纷要求与中国开展学术交流^[45]。1971年5月16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关注到“大陆中国在渥太华新设立的大使馆接到期望去中国访问的美国教授们‘潮水般的’申请和询问”^[46]。

北京的人民外交在美国引起了民众的积极响应,后者要求改善对华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声,无疑与尼克松政府在力求改变对华关系的同时坚守台湾在联合国代表席位的立场相违背。为了应对国内的政治压力,尼克松政府提出了一套“杂糅‘人民的’和政府的外交”。美相关对华决策部门于1971年5月底分析指出:北京的人民外交旨在通过在美国和世界民众中制造舆论,将“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并迫使美国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做出更多让步;不过,这的确为美国政府缓和对华关系提供了机会,应努力将两国交流转移到政府层面或以某种适当方式让政府参与到民间交流之中^[47]。

在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发布后,美国各界要求访华、与中国开展交流的申请再次激增。为了增强对民间交流的掌控,“杂糅‘人民的’和政府的外交”策略亟需具体绸缪和付诸实施。1971年的7、8月间,基辛格获得了两份关键性的建议。总统科学顾问小爱德华·大卫(Edward E. David, Jr.)提出,在总统访华代表团中加入总统科学顾问和一位精通技术、政治可靠的专业人员,以更直接、准确地了解中国的科技状况,为两国在科技领域的交流做准备^①。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建议,尼克松在访华时要向中方表明美国政府鼓励在两国间开展科技、学术和其他交流,并有意签署交流协定。鉴于北京更倾向于以非政府方式开展交流,鲍大可还提出,对华的科学和学术交流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三个联合赞助组织——国家科学院、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与中科院对接;体育、文化和艺术团体的交流,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对接;并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充当沟通两国间非政府交流信息的平台^[48]。这些建议几乎都被采纳。基辛格在1971年10月第二次访华时,正式向周恩来提议在两国间开展科技、文化、体育和新闻交流^[49]。恰在北京时间10月26日早晨基辛格启程返美之前,第26次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50],美国民众要求访华的呼声愈加高涨。

1972年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率先遣组访华,希望在联合公报中表明美中未来将开展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以作为尼克松访华

① China Trip, July-November 1971, [2 of 2], July 1971-November 1971, MS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0002,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 Section 0002; The President's Trip Files. Richard M.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pp. 92—94. 在备份备忘录封页上,基辛格向其东亚事务助理霍尔德里奇(John H. Holdridge)交待了两点:“加入我的行程的准备中,作解释;告诉他,在我们考虑代表团和日程的问题时,我们会考虑(他的建议)。”

的成果^[51],中方对这些提议均表同意^[52]。1月底,美方提出了两国开展科技、文化交流的具体方案,其所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外科、生态学和环 境、计算机中文字体排版、气象、海洋科学、化学合成、农业工艺、植物培植、生物医学、天然产物、人口动力学及节制生育、血吸虫病、公共卫生及实行保健、动物学、无线电-电视-电影等。此外,美方还提出交换学术科学杂志和出版物、学术代表团、科学和学术领域专业代表团,邀请中国学术研究人员在美国进行研究工作,以及对等基础上支持两国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语言等建议。中国外交部很快将其送交中科院外事组联络人,但后者对这些项目最终是否能够达成并不乐观。中科院党的领导核心小组副组长刘西尧强调:“鉴于中美未建交,我们同意只能搞民间来往,不能搞政府间的来往,而且民间来往的对方,必须是同台湾没有关系的。”除中科院外,交流方案也被转发给第一机械工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农林部、冶金工业部、气象局、国家海洋局、电信总局、中央广播事业局、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等单位征求意见^[53]。经过与老科学家会商,中科院核心小组在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议定了《关于中美科技交流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于2月14日答复外交部。《意见》提出,对美民间科技交流的前提为“确保国家机密”,依据的基本精神是“对美国人民和科技界多做友好工作,扩大我国影响”,基本原则为“以我为主,有来有往”,组织方式为“在民间基础上,以全国科协、专业学会或中科院的名义”,交流目的有四项——“加强对美科技情况的调研,引进对我有用的先进科学技术,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扩大我对美国人民的影响”。《意见》对美方提出的项目分为“拟予拒绝”“拟基本同意”“拟对其内容有较大变动”三类,还增列一类“我方拟主动提出的交流项目”^[54]。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与美国务卿罗杰斯举行的“第二层会谈”充分讨论了两国民间交流问题。罗杰斯首先坦陈了“美国准备好按照中国人认为合适的方式和节奏”来发展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姬鹏飞则肯定“政府应该对改善民间交流的进程给予协助”。罗杰斯不仅赞同,而且重申:“改善民间交流是走向正常化的一个步骤,美国准备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的节奏来促进交流。”在提议双方首先讨论增进民间交流的原则后,他又一次强调:“美国已经准备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的速度促进交流。”^[55]此外,两国政府要为两国人民间进行“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交流“提供便利”的原则,被写入《上海公报》^[56]。这两个原则成为中美科技交流得以顺利重启的政策基础与政治保障。

中共中央在1972年3月中旬发出内部通知,要求高层干部加深对新的对美政策的理解,着手恢复与美国的交往,“要大做美国的工作”,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57,58]。1972年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作为美国第一个科学家代表团访华,是年底中国科学代表团作为中国第一个科学家代表团访美,以及1973年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代表团访华,都是基于尼克松访华前后中美政府双方的共识而获得政府推进的民间科技交流活动^①。此

① 参见朱永行《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促进我国科技现代化》,刊载于《国际科技合作征程》第一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0—91页。关于美国科学家协会访华、中国科学代表团访美,参见:参考文献[2]第141—145页;黄仁国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第106—111页;参考文献[54]。

外,经周恩来批示,中科院在1972年颁发《中国科学院关于对外交换书刊等工作的暂行规定》和《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研究人员对外通讯联系的几点规定》,调整了对美开展科技资料交换的政策,除允许与美国民间(也包括一些有官方背景的)学术机构和团体建立正式图书资料交换关系外,还可接收美官方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寄来的图书资料,并且必要时可表示感谢或回赠,但暂缓与之建立正式交换关系^[59]。

在“乒乓外交”后,邀请两位美国科学家于1971年春访华是中国最高决策者推动对美开展人民外交的再次实践。人民外交是新中国在与“列强”未建交状态下发展关系的有效路径,植根于革命时期中共与西方世界打交道的历史经验。然而,最终是高尔斯顿和西格纳,而不是普尔普拉或其他美国公民获邀访华则具有偶然性,这与申请者通过中国外交渠道和受国内政治运动影响的中科院渠道呈递申请有很大关系。信息的呈递渠道决定了信息本身能否进入历史决策者的视域。更为重要之处在于,事件的发生是否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最高决策者彼时视域中更为重要的事件序列相接合。邀请两位美国科学家访华,发生于中国最高决策者继续推动两国幕后渠道秘密外交向公开的人民外交转轨之时。此举除了要通过宣传重塑民众对美观念、为政策转向作思想准备,还意在与美政治博弈中通过“争取人民”倒逼美方改变对华问题的立场。总之,由政府推动的以人民外交形式开展的民间科技交流的历史进程,隐匿着国家间的政治博弈。

3 民间科技交流的张力与矛盾

1973年2月基辛格访华,中美两国政府就双边交流的内容达成初步协议,民间科技交流的程序也基本确定: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内的团体提供具体交流建议;在此基础上,美国务院派代表与中方外交部官员在北京进行讨论并生成“一揽子计划”;在设于华盛顿的中国联络处的协助下,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等组织与中国科协等中方对等交流机构开展具体协商^[60]。中科院是这一时期中方归口管理对资本主义国家科技交流工作的机构。在1973年科技外事工作总结和1974年活动计划中,中科院提出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技交流的新方针——“洋为中用、不卑不亢、多做工作、热情友好、谦虚谨慎”^[61]。

为彰显政治关系的进展,中美两国政府客气、谨慎地做出妥协,以促成民间形式的科技交流的开展。由政府推动的一系列“高调壮观”但“形式胜于实质”的交流活动,在两国民众间渲染起友好热情的氛围。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双方普遍持有的负面刻板认识,并为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但是,转变很快发生在1974至1975年间。美国总统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并最终辞职,中国的政治、思想、理论随“批林批孔”运动再次陷入混乱。中美政治关系僵化不前,包括科技交流在内的民间交流波折不断,双方对彼此的不满甚至矛盾日益公开。政治压力而非来自政府的赞助,最终阻碍了两国民间交流的开展([62],页82—85;[63])。

科技交流可以成为政治博弈的工具,而科学家不会甘愿被驯服。1974年,在美国国家美术馆举行的中国考古展的新闻发布会被迫取消、美国几支访华学术代表团中某些成员因政治原因遭到北京拒绝等事件,引发了孔杰荣的担忧。作为1972年5月美国科学家

协会访华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于 1974 年底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中国几乎拥有决定谁将访问、访问多长时间、看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会见谁的独断权力”,北京“操纵对中国的访问”并进而影响媒体舆论,“中国外交官还对促进交流的民间组织施加压力,以影响它们的出版物”。他敏锐地洞察到,美国公众、组织机构对在此前民间交流中所奉行的原则——“按照中方认可的方式”的态度,已经今非昔比:“20 世纪 50 年代分隔我们两国的苦难已经结束,同样结束的还有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使美国人的批判能力瘫痪的‘马可波罗病’。”^[64]

对于这一时期包括科技交流在内的中美民间交流出现的波折,两国当事人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叙事,且常常将责任归咎于对方^①。在中美民间交流重启五周年之际,时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斯坦福大学美中关系项目主任穆雷(Douglas P. Murray)撰文,试图跳出对责任追究的局限,揭示“民间”交流的根本矛盾。他认为中美民间交流不仅是两国“特殊政治关系的晴雨表”,更深受两国“政府推动”这一交流形式的制约,特别是两个政府在制度上有着“本质差异”。它们对于“官方”“私人”“互惠”以及来访者“可信性”的理解完全不同,致使“民间”交流难以摆脱政府影响和政治色彩^[65]。

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民间形式”和其由政府掌控的“政治性质”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可调和的张力,并最终致使两国政府在民间交流的程序与形式问题上产生了根本性的矛盾。为了显示中美关系向着正常化方向迈进,《上海公报》明确鼓励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领域开展交流。限于两国未建交的政治状态,这些交流只能采取“民间”的形式;而正因为两国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民间交流又不得不由两国政府给予“协助”。在中国方面,通过掌控签证审批的主动权,中国领导人和政府能够严格控制来访者的身份,根据自己的政策目标,在大量签证申请中,自主选择那些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中国、在学术专长上为中国所需的美国申请者。而在美国方面,早在 1969 年 7 月尼克松政府所释放的第一个缓和对华关系的政策信号中,即放松了包括科学家、学者等六类人员访华的旅行限制。这意味着,美国方面在对这几类美国公民赴华的护照申请全面签准的同时,中国方面“几乎肯定不会”对他们的申请做出回应。这自然会致使在中美两国签证审批的问题上,不平衡、不对等的问题日益突出^[66]。一方面,美国政府无法阻止自己的公民向中国政府申请访华签证,而中国政府完全拥有对美国公民访华的控制权;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政府对中国人访美有着严格的政治限制,使得美国政府对访美的中国申请者的选择范围和选择权都微乎其微。尼克松政府的高级官员们抱怨道:“在北京的术语中,‘民间交流’的意思是‘中国政府与美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即使是《上海公报》中使用的‘政府协助’的概念,对中国人来说也可能只是意味着,政府将向访问中国的团体或前往中国的美国人发放适当的证件。”^[67]

① 前引孔杰荣一文显然认为是“美中两国政治关系”和中国方面“明显的政治原因”,给中美双边科技学术交流带来“压力”,制造了“障碍”。白莉娟在 1987 年的文章明确将始作俑者指为“中国文化政策的独裁者”江青。参考文献[59]第 84—85 页。毛瑞鹏则对基辛格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在这一时期持有的相似观点,视为“显然没有认识到或不愿意承认其真正的原因”,即美国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的拖延。毛瑞鹏《关系正常化与人文交流——建交前后中美关于人文交流的磋商》,刊载于《美国问题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37—40 页。

就尼克松政府而言,在其就任之初便确立起运用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外交工具为美国外交服务的战略,积极推动中美双边民间交流的目的也在于改善中美关系、在对苏冷战中争得战略优势。然而,为了实现外交目的,其推动对华开展科技等民间交流的政策与行动,内存着无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为了让北京同意通过官方外交渠道商议,并作为外交成果在《上海公报》中公布双方在民间交流问题上的一致立场,美国务卿反复重申“按照中方认可的方式与节奏”的原则,无疑是针对中方的要求和顾虑所做出的妥协。甚至与孔杰荣一同访华的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团长戈德伯格以及斯通,都曾不断强调“只要适合中国的需要”,美方可以做任何改变。然而,另一方面,囿于北京的人民外交给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带来的政治压力,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在推进民间交流的同时设法避免陷于被动。在《上海公报》发布后,为了应对中方对民间交流往来人员进行选择与控制,美国政府内部涉及对华民间交流各部门主管领导达成了共识,即政府必须确保中美民间交流是双向的。为实现此目标:其一,美国要扶植非官方的“联盟组织”(umbrella organization),作为美国政府控制、影响中美民间交流的“首选工具”(chosen instrument),并使其获得中国政府认可、为中美民间交流提供赞助,从而阻断中国政府对经费赞助者和访华者的选择。其二,美国政府收到的所有私人团体和个人的赴华交流申请都需要提交国务院,由负责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主管;对于那些通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中国设在渥太华、伦敦、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办公室与中国联络的美国团体,美国政府要尽力“影响这些联络”。为了让更多中国人能够来美国访问、全面了解美国,他们还提出包括充分利用太平洋两岸深厚的学缘与业缘的九条“战术”([68],页5—20)。这些应对人民外交的组织、制度与“战术”,显然与美国政府在外交层面上抱持的“按照中方认可的方式与节奏”开展交流的灵活变通姿态相抵牾。

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开启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以民间科技交流促进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是两国决策者、科学家等历史行动者所表达并且被记录在案的良好愿望。两位美国科学家在1971年春季访华之所以“能够”发生取决于决策者的目的,但事件的发展及其影响并不能仅仅被、继续被决策者的意志把控。在两国未建交状态下,民间科技交流从设定程序、提出项目、商榷方案、遴选人员,到组织接待,完全受到政府的掌控和政治力量的干预。其结果不仅是科学家的反抗,而且受两国内部政治波动与国家间矛盾的影响,包括科技交流在内的各项民间交流至1975年都几近被扼杀。此种状况之下,民间科技交流又何以能够推进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同样,如果没有中国国内政治、发展战略与对外政策的先期调整,科技不可能进入中美建交后签署第一项合作协议的重要领域,两国科技关系也不可能从民间交流转向政府间合作。

4 结语

科学技术的跨国交流对于科学家、政治家而言的不同意义与价值,会给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什么?科学技术没有国界,但冷战时代两大阵营不但政治对峙,而且以核武器竞赛为防。在科学家们看来,科学事业的国际性使得他们自身即便在国家间因政治对立甚或战争状态下也能受到尊重。他们论证说,在历史上,科学家常常能

够跨越国境而自由地旅行、受到接待,甚至在战争期间的敌对国家也能被接受。他们相信,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未来,科学家为了科学事业而进行的国际活动通过推动科学进步而益于全人类^[11, 12]。对于政治家和决策者,科技是扩张国家权力边界的手段而非目的。作为诸多意义呈现形式之一,尼克松政府时期的中美民间科技交流作为缓和对峙关系的工具而非增强对抗的手段被加以利用。对于以“遏制战略”等符号来定义冷战的冷战史研究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然而,历史的结果并不遵循决策者的初始愿望。尼克松政府时期中美科技等领域的民间交流的开展,不断受到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国内政治、党派纷争等多因素作用甚至支配。中美民间科技交流并没有以两国关系的缓和为结束,而是几近于中断。两国政府间这场以人民为标的的政治博弈,最终引发了人民的反抗。国家权力与国家间政治的关系状态决定着科技交流与合作的行进;或许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工具,毫无决定前者的力量。换言之,科技交流与改善国家间政治关系——二者并无必然性;必然性的假设不过是决策者们共有的美好愿望。国家间关系的根本问题在于关键性政治问题的解决,或者各方至少能以灵活方式予以处置,使政治痼疾不成为两国战略的第一考量,取而代之的是解决经济问题、国际问题或其他与科技交流相关的问题。可以说,关于科技外交的一个积极性假定——科技交流改善国家间政治关系,这一命题成立与否在于决策者如何看待科技在国家利益中的位置与作用。此外,除了国家间的政治博弈,对外科技交流也常常受到国内党派政治斗争与博弈的干扰和利用。这些问题仍待进一步的探讨。

参 考 文 献

- 1 刘西尧. 对《美方交来的关于科技、文化交流的建议》的批语[Z]. 1972-01-30.
- 2 张静. 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缘起、实践与叙事(1971—1978)[J]. 美国研究, 2020, 34(5): 131—136.
- 3 Text of 134th meetings on 1/8/68 between U. S. and Chinese representatives[Z]. Department of State, 1968-01-11; 4—6, USDDO[DB], CK2349119897.
- 4 张静. 美国国务院与中美关系缓和研究(1969—1972)[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 5 Transcript of a press and radio news briefing with John Thomas, former Director of Refugee Affairs in Vietnam[R]. 1969-02-18. DDR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DB]. CK3100516424.
- 6 Memorandum from Marshall Green to the Under Secretary [R]. 1969-10-06. DNSA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DB]. CH00079. 3—5.
- 7 William P. Rogers's Keynote Address, "U. S. Foreign Policy in a Technological Age." [A].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Astronautics,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ternational Science Policy. *A Complication of Papers Prepared for the 12th Meeting of the Panel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9, 13—15.
- 8 U. S. China Policy 1969—1972[R]. Folder: U. S. China Policy 1969—1972, [1 of 2], Box 86,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 Henry A. Kissinger Office Files, Country Files-Far East, NPMSP, NARA II.
- 9 Draft 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06[R]. Washington, 1971-02-16, *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C]. 1969—1976, **XVII**: 263.
- 10 中国科学院. 关于中美科技交流问题的意见[R]. 1972-02-14.
- 11 美国全国科学院执行秘书杜德给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拉德伯哥的信[Z]. 1971-02-01.
- 12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拉德伯哥给郭沫若院长的信[Z]. 1971-02-13.
- 13 普尔普拉的两封信件中译本、郝梦笔的批示[Z].

- 14 上海市革委会外事组、科技组给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并外交部、中科院。关于美国叶希瓦大学爱因斯坦医学院教授普尔普拉要求来我国访问的情况报告[Z]。1971-06-04。
- 15 毛泽东。给李达的信[A]。注释4。1951-03-27。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6。
- 16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A]。1951-09-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96。
- 17 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A]。1952-04-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47。
- 18 毛泽东。关于对日本应明确提出外交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批语[A]。1955-09-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384。
- 19 周恩来。关于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A]。1956-06-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31—333。
- 20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M]。裴克安，等译。马清槐，等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655—656。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22 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6年中美关系的演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 23 Public Statements on China by U. S. Officials, 1971-03-16[R]。NSC Files, Henry A. Kissinger Office Files, Country Files-Far East, Box 86, Folder U. S. China Policy 1969—1972 [1 of 2], NPMSP, NARA II.
- 24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2册[M]。吴继淦，张维，刘朝，增译。秦人，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 25 我体总举行欢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仪式中美两国运动员进行乒乓球友谊赛丁西林会见代表团团长等进行友好谈话[N]。人民日报，1971-04-14：6。
- 26 Message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Washington, 1971-05-10. *FRUS*[C]。1969—1976, **XVII**. 318—319.
- 27 张静。尼克松“改变世界的七天”是如何实现的？[J]。百年潮，2010(1)：64—69。
- 28 Letter from Arthur W. Galston to Mr. Hsu Chung-fu, Charge d'Affairs a. i. ,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Ottawa, Canada[Z]。1971-04-14.
- 29 Letter from Ethan R. Signer to Mr. Hsu Chung-fu, Charge d'Affairs a. i. ,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Ottawa, Canada[Z]。1971-04-14.
- 30 Letter from Arthur W. Galston and Ethan R. Signer to the Ambassado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Paris, France [Z]。1971-04-14.
- 31 中科院外事组李明德的报告[R]。1971-05-05。
- 32 中科院外事组李明德草拟的给外交部欧美司的回复[R]。1971-04-30。
- 33 钱大镛致李明德函并关于接待美国两名生物学家访华的计划[R]。1971-05。
- 34 中国科学院、旅游局联合接待小组。美国科学家高尔斯顿、西格纳活动日程[R]。1971-05-14。
- 35 欧美司刘东海致中科院外事组朱永行函[R]。1971-05-24。
- 36 中国科学院、旅游局联合接待小组。接待两名美国科学家工作总结[R]。1971-06-29；3—5。
- 37 中国科学院、旅游局联合接待小组。接待美国两名生物学家情况简报第5期[R]。1971-05-16；3。
- 38 中国科学院、旅游局联合接待小组。接待美国两名生物学家情况简报第6期[R]。1971-05-16；2—3。
- 39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编。美科学家高尔斯顿、西格纳访沪简报[R]。1971-05-22；2。
- 40 对《旅游局电话记录：两个美国人入境情况》的批示[R]。1971-05-11。
- 41 中国科学院、旅游局联合接待小组。高、西两人来华后的主要表现[R]。1971-05-18。
- 42 中国科学院、旅游局联合接待小组。接待美国两名生物学家情况简报第1期[R]。1971-05-12。
- 43 美报说美两科学家访华“打开了第二轮的乒乓外交”[N]。参考资料，1971-05-30(下)：9—11。
- 44 Letter from Frank C. Bennett, Jr. to Richard H. Howarth, Esq[Z]。1971-06-18. RG 59 East Asia & Pacific Affairs Lot Files\181-301-Box 5\210-232-EA-ACA Official-Informals Jan-June 1971；1. NPMSP, NARA II.

- 45 Letters[Z]. RG 59 East Asia & Pacific Affairs Lot Files\302-346-Box 6\346-TP-8 Fairs and Exhibitions; RG 59 East Asia & Pacific Affairs Lot Files\181-301-Box 5\244-245-EDX 1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China (General) April-June 1971, NPMS, NARA II.
- 46 美报报道一些学者教授纷纷要求访华[N]. 参考资料, 1971-05-16(下): 76—77.
- 47 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24[R]. Washington, 1971-05-27, *FRUS*[C], 1969—1976, **XVII**: 327—328.
- 48 Letter to Henry Kissinger from A. Doak Barnett, fro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Z]. 1971-08-27, USDDO (U. 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DB]. CK2349525521.
- 49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R]. Washington, November 1971, *FRUS*[C]. 1969—1976, **XVII**: 557.
- 50 亨利·基辛格. 白宫岁月: 第3册[M]. 杨静予, 吴继淦, 刘觉涛, 译. 秦人, 校.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1006.
- 5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R]. Beijing. January 3, 1972, midnight, *FRUS*[C]. 1969—1976, **XVII**: 642.
- 52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s Deputy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Haig)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R]. Beijing, January 8, 1972, *FRUS*[C]. 1969—1976, **XVII**: 651.
- 53 外交部钱大镛同志发给中科院外事组朱永行同志《美方交来的关于科技、文化交流的建议》[R]. 1972-01-28. 刘西尧的批示[C]. 1972-01-30.
- 54 中国科学院. 关于中美科技交流问题的意见[R]. 1972-02-14.
- 5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R]. Department of State, 1972-02-22, 2: 00 p. m. , *FRUS*[C]. 1969-1972, **E-13**, document 91: 1—4.
- 56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N]. 人民日报, 1972-02-28: 1.
- 57 李明德.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1972年访美背景和简况[J/OL]. 4. (2015-12-14) [2019-07-08]. <http://ourenghish.org/65classmates/CNscientists1972VisitUSA01082016.html>.
- 58 中国科学院外事组. 一九七二年科技外事工作初步总结(业务部分)[R]. 1973-02-10.
- 59 高珺. 搭建20世纪70年代中美科技交流的多米诺牌——以综合科技代表团互访为例[D]. 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21: 23.
- 60 Kathlin Smith.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Normalizing U. S. -China Relations: 1965—1979[J]. *Annals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98-12-30.
- 61 中国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 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 当代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史[Z]. 1999. 31.
- 62 Jan Carol Berris. The Evolution of Sino-American Exchanges: A View from the National Committee[A]. Joyce K. Kallgren and Denis Fred Simo eds. *Educational Exchanges: Essays on the Sino-American Experience, Research Papers and Policy Studies*[C].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 63 Pete Millwood. An “Exceedingly Delicate Undertaking”: Sino American Science Diplomacy, 1966 - 78[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21, **56**(1): 174—180.
- 64 Jerome Alan Cohen. U. S. -China Relations[N]. *New York Times*, 1974-12-18.
- 65 Douglas P. Murray. Exchange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ymbols and Substance[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76, **424**: 29—42.
- 66 Memorandum from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Richardson)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R], undated, *FRUS*[C], 1969—1972, Volume XVII: 51.
- 67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8[R]. Washington, 1972-03-09, *FRUS*[C], 1969—1976, Volume XVII: 843—844.
- 68 Submission of Response to NSSM 148[R]. 1972-03-23; 5. DNSA[DB], CK1679051377.

People-to-peop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plomacy and Political Gamesma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ZHANG J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ino-US people-to-peop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plomacy occurred in tandem with the Sino-U. S. rapprochement. However, the former did not cause the latte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ld War, people-to-peop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plomacy served as diplomatic tools to ease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hostile nations, directly serving the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objectives of both countries. Participants in transnational exchanges, such as scientists, are both targets of political games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in popular diplomacy and are shaped by traditional political forces like nations, governments, and political parti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ld War and in the absenc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re existed irreconcilable tensions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civilian form of Sino-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plomacy and its political essence. These tensions and contradictions led to the inability of civilian technology diplomacy to promote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instead, they fell into a predicamen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nflicts.

Keywords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Sino-US rapproch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plomacy,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political gamesmanship